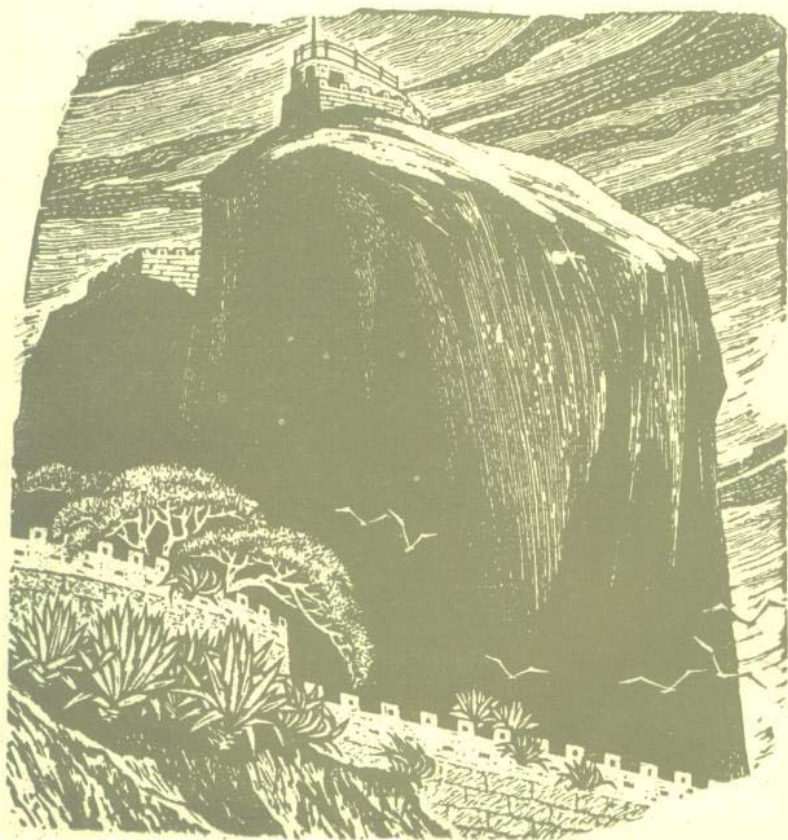


廈門文史資料

第十九輯

XIAMEN
WENSHI
ZILIAO



厦 门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厦门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九二年八月

目 录

林文庆传略·····	毕观华 (1)
林文庆的办学主张·····	洪永宏 (18)
颜西岳先生事略·····	江菱菱 (24)
柯凌汉在厦门二三事·····	陈建盛 (38)
厦门工商联(总商会)简史·····	陈逢源 (41)
厦门纺织厂筹建纪实·····	姚自强 (55)
厦门、杏林海堤建设见闻·····	郭昆山 (61)
厦门开辟新区见闻·····	郭景村 (68)
阻力重重的厦门市政建设·····	洪卜仁 (93)
抗战前厦门大学建筑史·····	陈延庭 (102)
厦门中山公园琐记(附《申报》有关厦门筹建公园的 报道)·····	李 禧口述 陈王琮笔录 (115)
我国最早的一所幼儿园·····	黄雅川 余丽卿 (119)
福民小学校史·····	叶更新 (121)
厦门学店真相·····	叶春培 陈永谟 (139)
厦门图书馆的建立·····	余少文 (149)
夜袭金门岛·····	纪 华 (150)
厦门沦陷时期的邮政·····	刘 慎 (156)
大中路的日本御料理·····	士 钰 (161)
民初厦门道自治讲习所·····	陈长河 (165)
陈文麟自英驾机返厦经过·····	洪卜仁 (172)
厦大基督教学生公社·····	陈世义 (177)
解放前的娼妓简况·····	姚自强 (183)
抗战末期训练“台湾警干班”学员见闻·····	李度青 (190)

林文庆传略

毕观华

1957年1月1日，新加坡失去了一位一生充满传奇性，横跨19及20世纪的风云人物——林文庆医生。

有“新加坡大老之称”的林文庆一生共活了88岁。在他逝世时，新加坡的首席部长林有福这么说：

“渠乃一少数知道如何过一完全活动及有用之生活；为他人而非为自己制造机会，彼之逝世不但是新加坡，而且是马来亚及整体华侨之重大损失。”

陈育崧在回想他对林文庆的印象时这么形容他：“……有时我回忆少时听他对群众演讲，他那一口悦耳的英语，滔滔不绝的辩才，那短小精悍的身躯，活泼的举动，把每一个听众的心弦都打动了，把萎靡不振的唐人都打了气！”

1869年林文庆出生于英国殖民地政府统治下的新加坡，他可说是一个道道地地侨生华人，祖父林玛彭于1839年自福建厦门海沧（原海澄县）南来，定居檳城，林文庆的父亲林天尧便是其独子。林玛彭后来移居新加坡源顺街，父子俩人皆在章芳琳的鸦片局及酒庄任职。林文庆的双亲在他年纪甚小时便先后过世，因此他是由祖父母带大的。自小接受英文教育的林文庆，也曾入学前念过四书五经，那是在他未进入吉宁街政府英校（Government Cross Street School）及莱佛士学院之前的事。因此虽为一峇峇，林文庆还有机会接触到

中华文化。这点相信对他日后热心孔教及中华民族思想改革有很大的关系。在莱佛士学院进修的那段日子，林文庆对英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由于他受到校长胡列特氏（R. W. Hullett）的鼓励。由于其天资过人，林文庆在18岁那年便成了女王奖学金的得主。1888年在莱佛士学院的年终颁奖礼上，校长胡列特就曾这样地夸奖他：

“……我深信文庆将超越他人。长久以来，我看着无数学生步出校门，踏入社会的门槛，但我从未对像他那样学生的前途这样有信心。”

1888年，林文庆前往英国的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深造，念的是医科。据林文庆夫人后来所说，林氏学医，有这样一段故事：林文庆的父亲在一次剃须时不小心割破皮肤，因而导致破伤风。但当时的医生却不知如何医治，最后他的父亲因此而死亡。这深深地刺激了林氏，他便从此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这点和鲁迅的弃医从文的经验可说是恰好相反。

林文庆在医学院的成绩可说是十分优越，他在1892年便考获了医科学士和外科硕士，但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他在剑桥从事的医学研究计划只进行了一半便告中止。虽然如此，他在皇家学会的哲学会报（Philosophic Transactions）上所发表的几篇论文如“论犬类心脏的神经系统”（“On the Cardiac Nerves of the Dog”）及“蚯蚓的黑色液体及其保护机能组织”（“The Colemic Fluid of Lumbricus Terrestris in Reference to a Protective Mechanism”）都受到当时英国医学界人士的重视。”

1893年林文庆回返新加坡，首先在直落亚逸的老家创业行医，在短期内就因为治好当时新加坡领事黄遵宪的肺病而名声四播。在悬壶济世的同时，林文庆也开始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活动，他的辩才也在此时表露出来。林氏最初在好几次

的公开集会中发表演说，如1894年3月30日，由市政府召开的反鸦片集会中，他极力反对华人抽鸦片的习俗。他的论见后来有系统地出现在其与宋鸿祥（旺相）合编的《海峡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里。就抽鸦片这一项恶习来看，林氏不但劝人放弃，也呼吁政府积极的予以行动上的支持和帮助：

“任何文明国家的政府都会把遏制恶行与罪恶当成是其职责所在，在本文里，我们希望唤起殖民政府正视抽大烟所带来的灾害，及其从此种奢侈品得来的税收以及在道义上对贫苦无助的鸦片烟受害者所应尽的责任。”

林氏呼吁政府设立戒烟馆，帮助那些下定决心欲戒除大烟的人士。他也请求侨领极力开导年青的一群，以免他们重覆歧路。在林文庆看来，让人民认识公众言论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通过群众的参与时事，将能进一步建立一种社会良心，这便有助于人民适时作出自我更新。

值得注意的是，林文庆在演讲会上所发表的言论观点是公正客观的，他並沒有哗众取宠，亦不奉承政府。这可从他于1895年1月11日在市政厅参加由海峡殖民地协会（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ssociation）所召开的民众集会上的表现看出来。在会上林文庆把当时殖民地人民不满英政府把军费负担加诸其身的情形与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因抗拒英政府所施予的重重税务相比，並认为英政府一味不顾民意的作风将导致历史重演。他那动人的演说及无畏的精神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大胆言论，使林氏几乎失去成为立法议员的机会。

不过由于报章及公众言论的热心拥护，林文庆终于在

1895年8月22日受委为华籍议员。这也可说是林文庆作为一个社会斗士的开始。

1896年，林文庆和友人詹斯医生(D.r Janz)主持由市政府举办的全市健康调查，他们证实了霍乱乃造成当时新加坡死亡率甚高的主要原因。此项调查说明了海峡殖民政府明了健康调查的重要性。在这一年，海峡殖民地总督委任林氏为莱佛士图书博物馆主管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任期间热心服务，同时也捐出了不少个人收集的标本及图书。林文庆担任博物馆委员之职一直到1910年他离开新加坡，前往中国时为止。

林文庆的兴趣并不局限于医药和文化。他可说是引入树胶作为经济作物的先驱者之一。那是在1896年，当他在植物园散步时，园长送了他几粒橡实，林文庆过后和友人陈齐贤合资在杨厝港开设首家华人树胶园。日后树胶之所以能在新马经济史上占了重要的一页。林、陈的大胆尝试，功不可没。难怪陈育嵩称他为“树胶种植之父。”

在这一年，林文庆娶了黄乃裳的女儿黄端琼为妻。黄乃裳是一位中国学者，亦是《天南新报》的创办人。父女2人对当时中国维新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大力支持。在他们的影响下，林文庆逐渐对中国文化起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开始关注起中国问题。

在殖民地政府管辖下的海峡殖民地，华人虽然占了人口的绝大部份，其社会地位却不怎么高。其中侨生华人虽在官方语言上比华侨占优势，他们在心理上多少是存在着一些矛盾的。因为不论他们如何在生活方式上与英国认同，英国人並不把他们当成是其中一份子，而在华人社会中，峇峇也不为华侨所接受。在后者看来，他们是无根的一群。在种种的因素下，林文庆率先投入华人的自觉运动，为提高海外华人的

素质和地位奋斗。自1894年林氏在一次民众集会中发表了“峇峇是堕落抑进步？”的演讲后，他便积极地朝向这方面发展。

1897年3月，林文庆创办了“中国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极力鼓励和他一样的土生华人学习中文，並宣扬孔孟圣贤之言，同时也藉此想唤起峇峇们正视中国时事。一个月后，他再联同宋鸿祥合办《海峡华人杂志》。这份杂志的创办宗旨和“好学会”一样，主要是向海峡华人灌输中华文化。在其创刊号中，林氏明白地指出创办该杂志的宗旨在于：“促进海峡华人智力及指导当前混沌的公众言论，使其得以步上正轨。”

从那时开始，林文庆不断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向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阐释中华文化，他所发表的主要论文有“中国文学选”（“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侨学的基本伦理”（“Basics of Confucian Ethics”）
“儒家政体下的妇女地位”（“Status of Chinese Women Under A Confucian Regime”）等。林文庆发表在《海峡华人杂志》的第一篇文章，名为“我们的敌人”（“Our Enemies”）。在文中他提出与阻碍中国向前发展有关的一连串问题。林氏深究其因，乃华人本身在教育、生活习俗及信仰方面的落后。有鉴于此，他提出“改革华人社会，去芜存精”的口号。

林文庆对中华文化的鼓吹，是思想上的吸收，而非形式的继承。因此他在1898年发起了一个剪辫运动，这在当时海峡华人社会中引起了一场骚动，保守派者如陈若锦、余连城和李清渊等人对于林氏此举大为震惊。因为辫子对他们而言，乃中华民族特征之一。而支持林文庆者如宋鸿祥、伍连德、陈武烈等却坚持思想的改进比蓄留辫子来得更为重要。

林文庆对辫子的观点可以从他下面这段话看出：

“……辫子并非我们衣饰的一部份。它仅是处理头发的一种方式。我之所以会极力反对这种习俗是因为它完全无用，也非常不方便……如果饱学多识，同时身为英国子民的华人并不准备放弃一切烦杂、不便而又完全无益的东西，那我们将不用希望他们会认真尝试，随时间的前进把华人传统观念及习惯适当地带入现代文明。”

虽然林文庆的立场是正确的，在当年他却受到不少人的非议，许多读者纷纷写信到《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责难林氏的言论。林氏此举甚至影响到他连任立法议员的机会。

既然辫子并不能代表中华民族，那甚么才能反映华族的特性呢？林文庆认为应从其文化、宗教和语言这三方面来找寻答案。这尤以最后一项为主。林氏深感学习华文乃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一环。而华语的使用将能更有效的达到目的：

“……把华语当成是我们基本课程的好处是，它乃3千万和我们同样国籍的人之日常用语。更何况所有华人知识分子都懂得华语。另外一点是华语在书写上与口头所说一样，而且当它成为书面文字时，不但全中国的人看得懂，日本、高丽、安南等国的人亦然……一旦了解了华语的句法，则有助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简洁文体的研究。”

然而林氏的这番见解并没有为多少人所赞同，那时候的新加坡帮派的观点依然十分强，不同方言群体开办的学校仍用自己的方言为教学媒介。这种情形一直到1929年闽帮茶叶巨子林庆年担任福建会馆教育主任，规定属下学校用华语教学，其他方言群纷纷仿效之后才有所改变。

林文庆在宗教文化方面则极力推崇儒学，认为它是语言外中华民族的主要特性。他一方面不反对中国人敬仰英雄人物，但他却不赞成对他们过于崇拜，以至沦为拜物主义。林文庆强调儒家的孝道，认为在拜祭先烈时应遵从“礼”——所谓的“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从1894年到1911年之间，林文庆发表了大量有关孔子学说的演讲及文章。此外，他和邱菽园也在新加坡创建了不少孔庙。由于他俩的鼓吹，在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掀起了一次“儒教复兴运动。”

紧接辫子风波，林文庆进一步提出女性教育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人不重视女性的教育是造成民族没落的主要原因：

“……把妇女置于低微愚昧及卑贱的地位，有朝一日，整个社会的人——不论男或女，都会成为一群低微、愚昧及卑贱的人。”

至于在课程方面，林氏认为应包括家政、语文、音乐及体育。为了实践其论见，1899年7月林文庆连同宋鸿祥、陈武烈等人开始筹款办学。

但由于当时华人的思想还相当保守，虽然林氏等人向华人社会的领导层呼吁求助，希望后者能予以道义及财政上的帮助，林文庆是失望了。因为他的这项计划并不能引起社会人士的多大兴趣，当然也得不到他们在金钱上的支持。林文庆于是捐出一块地作为校舍，加上朋友及支持者如邱菽园、瑞天咸（Sir Alexander Swettenham）等的资助下，林文庆共筹得6千元，开办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在开始时，学生只有7人，但在数月内却增至30多人。林文庆夫人这时也出来义务教导华文科。虽然该校屡因经费不足而几乎落得停办关闭的地步，林

文庆在为妇女提供教育机会的心机和努力是值得后人敬佩的。

1898年4月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知识分子在中国掀起了一次政治改革运动。这股浪潮很快就传到新马，这时林文庆发表了《中国的革新》一文，以英国、苏联为例子，进一步阐述他在另一篇文章《我们的敌人》中所持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所需的是公正的哲学思想及健全的科学……

只有当年青一代的人有了适当的训练，他们才能避免重蹈前人所犯的毛病……这只有在乡村有了学校，省府有了学院、大学才能实现。”

1899年，林文庆在创办了《海峡华人杂志》之余，接手闽商林衡南在1890年创立的《星报》，林氏将之易名为《日新报》（Jit Shin Pau）。林氏之所以接管《星报》的主要原因是想通过它来改变当时华人思想保守，知识水平落后的情况。因此他在《日新报》刊载了不少国际新闻及有关西方科学技术的报导。但由于经济上的困难，这份报纸只维持了2年。

1900年8月18日，林文庆连同其他知名侨生华人如宋鸿祥、陈若锦等人组织“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British Chinese Association），在此同时，林文庆也是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的成员及太平局绅。作为一名英国子民，林文庆自然对殖民政府效忠——这点可从他于1901年附议政府拨出一笔不超过2万元的款项来招待英国皇室的到访可看出。然而，林文庆始终不忘对中国的关怀。由于慈禧太后的夺权及幽禁载恬，康梁的维新运动只维持了103天。康有为于1900年流亡到新加坡，林文庆和邱菽园仗义收容了康有为，並助他在新加坡设立保皇党的支部。

林氏的支持康有为不但受到满清政府的指责，连本地的舆论界也对他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即使本地华人对光绪皇帝的处境深感同情，也不应该公开地与中国政府作对。如果有哪一位（指林氏）侨生华人参与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他应该受到殖民地法庭的惩罚。虽然林文庆在1901年脱离康有为，并向满清政府表示忠诚，这并不显示林氏对改革中国的热忱已完全消失，这点可从其日后极力支持中国民族运动看出。

由于政府的压力，林文庆暂时减少对中国的关注，并把注意力转向殖民政府及海峡华人。1901年殖民政府批准林氏早年（1897年）提出组织华人义勇军的请求，这支名为“第二连”的华人义勇军终于在11月成立。林文庆以身作则入伍，军阶为下士，当年林氏约32岁。

作为一名立法议员，林文庆继续为民请命。1901年他要求殖民政府在经济上资援莱佛士书院。次年在议会上，林氏则极力反对将英女王奖学金予以废除的动议。

1903年林文庆自中国参加商务会议归来后又再开始关注中国局势。为了唤起海峡华人对中国问题的注意，他在《海峡华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峇峇在中国发展事业上所扮演的角色”（“The Role of Bab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并从中分析侨生华人在中国的发展潜能：林氏认为中国若在财政管理上要彻底进行改革，势必用到一批新的官员，作为其新措施的引导及推动。峇峇一来通晓英文，能毫无困难地与欧美专家沟通，二来他们也算是华人，在感情上、形式上较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加上峇峇向与不同种族的人共处，思想及生活习俗方面不会过于保守，因此他们是为中国效劳的最佳人选。

这时候的林文庆依然反对用激进的手段来改革中国。在他看来，“革命”是一种要不得的罪行。

“谋反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件坏事，尤其是在中国。

敢于在今日中国计划革命者乃非我类。他是一个狂暴的恶魔——当他了解到其穷凶极恶的行动所带来的种种恐怖……”

1907年当清廷官员杨士琦到南洋拉拢新马华侨前往中国投资时，林氏充任其顾问及代言人。与此同时，林文庆也参加了一个遣送海外青年回中国受华文教育的训练计划。这项计划乃由清政府拨款支助，成绩优良甚至有机会在中国完成学业后继续前往欧美深造。

由于林文庆的参与中国及殖民地种种社会活动，没有太多时间集中于自己的医务，在1905年左右他退出了与友人罗柏逊医生（Dr M Robertson）合办的医务所。这对他个人事业来说自然是一种损失，但林氏却从不后悔。林文庆对中国热忱及专注再度引起殖民地舆论与抨击，认为他既然持有英国护照，作为一名英国公民，就应只效忠殖民政府，而不该想要两面沾光。

这种批评对林文庆当然是不公平的，他除了毫无怨言地牺牲了个人在医学上的美好前程。还在1907到1910年义务于英王爱特华医学院（The King Edward Medical School）讲学。他也曾代表学院出席由英国医学协会新加坡分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Local Branch）召开的重要会议。

1908年林文庆在妻子因为肺病5年前去世后再度结婚，他娶了友人殷雪村之妹殷碧霞。

这时，林文庆已开始觉悟到维新运动并不能使中华民族摆脱困境。他虽然不像林义顺、陈楚楠等人那么强烈的支持革命党，再也不把它当成洪水猛兽。这点可以从他向殖民政府保释孙文一事看出来。这时候的林文庆尚未成为同盟会的

会员。

参与革命与社会改革是需要以金钱作为后盾的，也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林文庆曾一度参与银行与保险业。成立于1912年的华侨银行，林氏为其副董事主席。此外，林文庆也曾投资于1917年成立的和丰银行，並担任董事。1919年林氏与爪哇糖王黄仲涵、黄奕住等组织华侨银行，並担任主席的职位。1920年林氏再与友人合资创办华侨保险有限公司，不过由于他在1921年应陈嘉庚之邀出任厦大校长，只好弃商从教。

在这之前，民国成立之时，林文庆也曾担任中国的卫生部长及1916年任北京外交部顾问，直至袁世凯继任总统方辞职。

实际上出任厦大校长也是林氏的最大愿望。早在陈嘉庚有意为中国尽一份力时，林文庆便建议他将这笔钱用来兴建一所大学，培育英才。厦门大学于1921年4月成立。由于当时的校长邓萃英因无法兼顾北京教育部与厦大的事务而辞职，林文庆便义不容辞的接受了这个空缺，前往中国从教。

厦门大学创建初年，不论在学生素质或教学设备方面都十分落后。陈氏回忆当时的情况：

“……林君于秋间开课前来到。开课后召诸生口试英语，问你从何方来，不能答，复问姓名亦不能答，而尤以闽省诸生为多。”

为了提高学生的教育程度，林文庆一方面设法收罗留学欧美的知名学者前来任教，另一方面尽力扩充校舍及种种设备。到了1926年，厦门大学已成为拥有文、工、医学院、科学实验馆、图书馆、体育馆、运动场及学生宿舍，一间规模宏大的大学了。这时，由于陈氏的树胶生意卷入逆境，不能兼顾厦大的庞大开支，步入晚年的林文庆只好再度奔走海

外，向殖民地的华侨筹款。这项任务一直进行到1937年他辞职为止。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乃处于新旧文化思潮交替之际。五四运动的冲击不已，政局的动荡不安，使中国新一代的学者采取了激进的手段来改革社会。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急切用西方知识和科学来推行教育，思想上采取中庸之道，主张以儒家修身治国的林文庆便自然成为他们的攻击对象。于是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林文庆成了祭品。林文庆对中国大学教育有其一套理论，在他眼中，孔子学说乃千古不易的道理，是培养民族领袖的不二法门；而鲁迅却要学生少读圣贤书。后者在一封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这么说道：

“……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然大以为然，说陈嘉庚正是“好事之徒”所以兴学……”

二者因为意见，价值观的差异，闹得很不愉快。加上接下来的学生风潮和经费困难，使厦大陷入困境，林文庆在孤掌难鸣下，辞去校长一职；厦大亦由中国政府接管。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新加坡后，林文庆发表了她的英译《离骚》。连士升在其《闲人杂记》中提到这件事：

“……我问林先生为甚么要翻译《离骚》。他告诉我，当他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人笑他是个峇峇，懂甚么文化。假如他继续在南洋谋生，那人笑骂任由他人笑骂，他可以置之不理。现在他要当厦门大学校长，那峇峇两个字仿佛一块烙铁，伤透他的心……他曾请教友人看中国古籍里甚么最困难。人家告诉他说，中国文学里最艰

深的莫如诗，中国古诗里最难懂的无过于《离骚》。因此他才下定决心，从事彻底研究，越研究越有兴趣，最后贾其余勇，把它翻译出来，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举成功，中外学术界人士，刮目相看，谁也不再把他当做不懂中国文化的峇峇了。”

实际上林氏之所以翻译《离骚》，还有另一番用意，这点可从其“自序”中看出：

“……如今当世局动荡不安，人人都在希望的边缘寻求政治安宁。译者将屈原这位一生为真理正义奋斗，伟大的爱国者的感情志气向读者展现，希望能给懦怯者带来信心，能抛开己利，为社会福利献出力量，无畏他人的误解、批评或攻讦。”

这时的林文庆，已经是65岁的老人。然而局势的剧变使他毫无喘息的机会。在中国本土发生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华北的消息传来新加坡后，殖民地的华侨展开了一系列的筹赈及抵制日货运动。

林文庆了解到日本的野心后，虽然不能像青年们一样奋力救亡而四处奔波，在言论上，林文庆再次发挥了他的演讲才华，号召海外华人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例如在1938年芦沟桥周年纪念日，新华侨民大会上，林文庆挺身呼吁华侨要不顾任何艰苦和牺牲来挽救中国：

“……我们不能放弃国民的责任，而全部仰赖于他人，假如我们放弃自助的责任，有钱者不出钱，有力者不出力，都是等于有意自绝于有心助我国之友邦自己跑回胜利之路。我们华侨纵不踏上火线也应从大处着想，下最大牺牲的决心，出到最后一文钱，尽到最后一分力，把数千万的华侨精

神统一起来，整个的华侨的力量发挥起来，把各自行动的救国团体联系而调整起来，在居留政府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设一最高的救亡机关……务使全体华侨一律奉行如经济之征募，劣货之拒绝，国民外交之运用，国际文字之宣传等……我们检讨过去的工作，有不少的缺陷。这些缺陷就是单顾一方面，忽略多方面……仅知内部之作，而忽略国际之宣传，仅作各个之活动，而忽略通盘之筹划……起来，我们华侨的同胞们起来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明白日本是我们的敌人……大家打破畛域的成见，毁灭封建的思想……。”

林文庆的这种“尽可牺牲我们自己救活后代或牺牲我们一世救活我们后代万世”的精神促使他忍辱求存答应篠崎护之（Mamori Thinozuki）组织一个后者称之为“治安维持会”（Peace Maintenance Committee）的“华侨协会”。

那是在1942年2月，日军在攻打新加坡之际曾遭受华人义勇军的顽强抵抗，加上华人之前热烈支持中国的抗日活动及抵制日货，因此在占领新加坡后立即展开一系列的“肃清行动”，将华人分区检证。林文庆没像筹赈会的中坚分子如陈嘉庚、庄惠泉、李俊源那样及时逃离新加坡或匿迹他处。在阿拉伯街（Arab Street）的集中营里，林文庆及其夫人为日军所寻获，林氏接着被带至警备司令部，在那里他见到了先前为殖民政府以间谍身份关了起来的篠崎。后者劝他创立一组织，以和日军合作为手段，把因为资助重庆政府或义勇军为日军检举逮捕的侨领收容进去。

林文庆当时已经是一个72岁的老人了。但他为了救出被捕的华侨及避免华人继续遭受屠杀，便答应了出任这个他自己易名为“昭南华侨协会”的会长。过后林文庆在吾庐俱乐